

往事堪回首

百年文化旧案新解

◎ 马嘶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往事堪回首

百年文化旧案新解

◎ 马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事堪回首:百年文化旧案新解/马嘶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5039 - 3441 - 4

I. 往… II. 马…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K26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7386 号

往事堪回首:百年文化旧案新解

著 者 马 嘶

责任编辑 喻 静 胡仰曦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李 圣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441 - 4/G · 704

定 价 28.00 元

前言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20 世纪的百年是一个大动荡、大曲折、大变革、大发展的特殊历史瞬间。在这短暂却又令人感到漫长的历史时光里，让人难忘的事件、人物、故事和迷雾何其多也。

20 世纪经历了近代、现代、当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又经历了封建帝制、北洋军阀封建统治、国民政府（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包括建国初期、“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等不同的国体、政体。

20 世纪的学界文坛，产生过不少疑案、悬案、迷案。这些遗案牵涉众多的历史事件、政策法规、人事纠葛、社会轶闻。而这些，又往往与学人文士的生活、事业以及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些遗案，根深蒂固、扑朔迷离地存留于这不平凡的百年沧桑中。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渐渐变得愈益神秘不可知，人们也愈来愈迫切地想探知其中的奥秘，明了其中的究竟。

这些遗案，有的由于当事人的逝去和资料的匮乏，真相尚未清楚地为人们所认知；有的由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无从识其庐山真面目；有的以讹传讹，愈久则离事实愈远；有的由于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的一锤定音，谬误成真理，或真理成谬误。

本书选取 20 世纪学界文坛为人熟知、受人关注又令人不明其就里的一些遗案，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追溯事情的本源，探求个案的奥秘，辨析世说的真伪，揭示历史的真相，以求为对中国现当代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感兴趣的读者们做一番曲径通幽的导游。

目录

北大“卯字号”称谓的由来	1
胡适何时取得博士学位	7
魏建功是鲁迅的论敌吗	16
王国维死因辨析	28
王国维罗振玉失欢真相	49
北京大学为何没有校歌	59
刘半农死情考释	64
“一二·九”运动中那句名言版权归谁	78
周作人被刺事件的真相	86
陈独秀绝笔书稿今何在	100

陈独秀的晚年由谁供养	110
胡适在“沈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125
胡适梅贻琦与“抢救学人”计划	140
胡适留在北平的藏书现归何处	149
解放之初周作人的“上书”考释	158
沈从文是怎样从文坛上消失的	166
沈从文与丁玲的恩怨	177
关露疑案始末	192
萧军如何成了“出土文物”	206

北大“卯字号”称谓的由来

谈起老北大的轶闻逸事，谁都不会丢下那个“卯字号”。

“卯字号”的称谓因何产生？“卯字号”名人是哪几位？溯本求源之后，又不免让人产生新的疑惑……

在一些记述北京大学早年逸事的文字中，曾多次提及“卯字号”的称谓和几位声名显赫的“卯字号”人物。这些虽是作为二十年代前后学界的轶闻趣事而流传后世，实则却真实反映了蔡元培执掌北大期间的那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宽松气氛，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有关“卯字号”的文字，最常见并叙述较详的有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的《卯字号的名人（一、二、三）》和张中行《负暄琐话》中的《刘半农》《刘叔雅》二篇和《流年碎影》第25节中的《前辈掠影》等篇。不常见的则是“卯字号”人物朱希祖1934年10月11日的日记，其中说得更为准确。

有人以为“卯字号”是老北大住房建制的称谓。因为老北大的学生宿舍有天、地、元、黄、宇、宙、洪、荒等斋，一院二院的东、西斋又有甲、乙、丙、丁……诸舍。如中国哲学门的顾颉刚和国文系的傅斯年曾同住在西斋丙字12号宿舍，三十年代史学系学生谢兴尧读预科时住在黄字号，入本科后又住天字号。这些皆是学校宿舍建制的称谓，而“卯字号”则是一个雅意的戏称，同宿舍建制毫无牵连。

关于“卯字号”的所在、由来和“卯字号”人物，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的《卯字号的名人（一）》中讲得比较清楚：

那时是民国六年（一九一七）的秋天，距我初到北京才只有五六个

月，所以北大的情形还是像当初一个样子，所谓北大就是在马神庙的这一处，第一院的红楼正在建筑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完全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而且其时那正门也还未落成，平常进出总是走西头的便门，即后来叫做西斋的寄宿舍的门的。进门以后，往北一带靠西边的围墙有若干间独立的房子，当时便是讲堂，进去往东是教员的休息室，也是一带平房。靠近南墙，外边便是马路，不知什么缘故，普通叫做“卯字号”，随后改做校医室，一时又当作女生寄宿舍。但在最初却是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个人一间，许多名人每日都在这里聚集，如钱玄同、朱希祖、刘文典，以及胡适博士，还有谈红楼故事的人所常谈起的，三沈二马诸公，——其时还只有沈尹默与马裕藻而已；沈兼士在香山养病，沈士远与马衡都还未进北大；刘半农虽然与胡适之是同在这一年里进北大来，但是他担任的是预科功课，所以住在译学馆里。《卯字号》的最有名的逸事，便是这里的所谓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事情，这件事说明了极是平常，却很有考据的价值；因为文科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则是辛卯年生，那是胡适之、刘半农和刘文典，在民六才只二十七岁，过了四十多年之后再提起来说，陈朱二刘已早归了道山，就是当时翩翩年少的胡君，也已成了十足古稀的老博士了。

这五位卯年生的名人之中，在北大资格最老的要算朱希祖，他还是民国初年进校的吧，别人都在蔡子民掌校之后，陈独秀还在民五冬天，其他则在第二年里了。……

虽然周作人在这里说“不知什么缘故，普通叫做‘卯字号’”，实则上在后面他就说清了这“卯字号”的由来，而且列举出“卯字号”的5位名人：生于己卯年的两个老兔陈独秀、朱希祖，与生于辛卯年的三个小兔胡适之、刘半农、刘文典。

比周作人晚一代，作为周作人和“卯字号”中的刘半农、刘文典学生的张中行，在《负暄琐话》之《刘半农》一文中写道：

他名复，号半农，江苏江阴人。生于光绪辛卯（十七年，1891），是北京大学卯字号人物之一。说起卯字号，那是北京大学老宅（原为乾

隆四公主府，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又改为沙滩后街）偏西靠南的一组平房，因为住在那里的教师有两位是光绪己卯年（五年，1879）生，有三位是辛卯年生。卯就属相说是兔，于是己卯年生者成为老兔，辛卯年生者成为小兔，其住所的雅称为卯字号，意为兔子窝。

在《流年碎影》的第25节《前辈掠影》中谈到周作人挽刘半农中的“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一联时，张中行写道：

卯字号，北大第二院西南部邻街的一排平房，民初作文科教员预备室，居其地者，陈独秀、朱希祖为己卯年生人，胡适、刘复、刘文典为辛卯年生人，故戏称为卯字号，言外意为兔子窝。

周作人是那几位“卯字号”名人的同事，他也曾是在马神庙北大二院那些文科教员预备室生活过的人物，即是在“卯字号”中呆过好些年的一员，只不过他不属兔而已。对于“卯字号”，他应是亲见的知情者。张中行在北大国文系读书是在1931年至1935年，而且亲聆过“卯字号”中三个小兔（胡适、刘半农、刘文典）的教诲，他读书时虽已是在红楼而不在马神庙，但其时距“卯字号”称谓产生的那个年代不过十余年光景，那些轶闻逸事还在北大流传着，因而他也可算是个亲闻的知情者。因而，他们的这些关于“卯字号”的回忆文字当是可信的。

“卯字号”老兔之一、后来离开北大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的朱希祖，还常常忆起北大旧事，他在1934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忆民国六年夏秋之际，蔡孑民掌校，余等在教员休息室戏谈：余与陈独秀为老兔，胡适之、刘叔雅、林公铎、刘半农为小兔，盖余与独秀皆大胡十二岁，均卯年生也。今独秀被捕下狱，半农新逝，余出至中山及中央大学；公铎被排斥至中央大学。独适之则握北京大学文科全权矣。故人星散，故与公铎遇，不无感慨系之。

朱希祖的这段话虽嫌简略，但确为第一手材料。朱希祖未谈及教员预备室的具体地点。他是在自己的日记中写的，当然用不着交代得那么详尽。他的回忆大致与周作人、张中行所述是一致的，只是在“卯字号”人物中，又

多了一个“小兔”林公铎（损）。查阅北大的史料，林损是在1934年离开北大的，朱希祖日记中说是“被排斥至中央大学”，实则是林损属于旧派人物，北大改组时，标榜革新，1934年他被学校辞退了。林公铎不服，大写抗议的文章，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致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胡适的信中甚至有“遗我一矢”之语。1933年8月26日《北平晨报》上题为《北大昨已开学，各系主任教授均已聘定》的文中报道：“文学院教授马裕藻、刘复、许之衡、林损……”而1934年4月26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北大国文系代表挽留三教授》报道中则说：

北京大学国文系系友会、交际代表孙震奇、石蕴华、徐芳、李耀宗等四人，原定昨日上午谒见校长蒋梦麟，再度挽留林损、马裕藻、许之衡三教授，嗣因各代表上午功课甚忙，遂改于下午三时谒见。但据蒋氏表示，对林、许二教授，于下年度，决定解聘，马教授则仍继续聘请。四代表于谒蒋后，乃再分赴林、马、许三教授之私寓，加以慰问云。

果然，在1934年7月10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北大下年度各系教授名单》中，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中就没有了林损。可见，林损是在1934年秋离开北大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这样，在后来周作人、张中行谈“卯字号”名人中，就没有提及林损（公铎）。

从周作人、张中行、朱希祖所提供的情况，关于“卯字号”，我们可以知道下列几件事：

一、“卯字号”的称谓，是在1917年产生的，而朱希祖更具体为这一年的夏秋之际。这一年的1月4日，蔡元培校长来北大赴任。过了几日，陈独秀也从上海来北大任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杂志移到北京来办。蔡元培锐意改革，陈独秀等人鼎力相助，延聘了一批根底深厚、学有所长的专家来任教，一时间，北大便出现了名师荟萃、思想活跃、学术繁荣、人才辈出的繁华局面。

二、“卯字号”的称谓，是在属兔的几位同事戏谈中产生的，这纯属笑谈，既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又不是什么成文的规定。但久而久之，则成为学界的一则轶闻逸事而流传后世。

三、这文科教员预备室之所以称之为“卯字号”，只是因为这里有那么

五六位属兔的先生，并非只是属兔的先生栖息之处。按严格意义上说，凡是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都应称为“卯字号”人物，但后来提起“卯字号”，总是首先想到这两个老兔和三位（或四位）小兔，这大概便是这称谓原本是从这几位的属相而起，因而也就以他们为代表了。

四、“卯字号”的称谓，恐也是由于北大学生宿舍有从干支中的甲、乙、丙、丁排列下来的旧例，因而便有了以子、丑、寅、卯序列排下来的“卯字号”。另外，“兔”又是一种聪明伶俐的象征，因而称“老兔”、“小兔”也并不觉得难听，更无辱人格之意，如若是有几位属狗、猪的，恐也便不好启齿了。

“卯字号”虽是由戏谈中所起，本没有任何象征意义，但这个称谓一旦形成并为人们所接受以至流传久远，这其中便就滋生了许多可以令人深长思之的意义，可以引发出繁荣学术事业的一些联想。

其一，由此可以了解当年大学教授的年轻化程度。比如，1917年，己卯年出生的陈独秀、朱希祖是39岁（虚岁），辛卯年出生的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林损是27岁，那年周作人也只33岁。39岁的陈独秀、朱希祖被称为“老兔”，就可见当年北大教授年轻化的程度了。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是50岁，文科教授中，年龄最大的崔适是66岁，辜鸿铭61岁，被人视为老朽的旧派人物陈汉章不过53岁，而讲授印度哲学的梁漱溟年仅25岁，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只有23岁（以上年龄皆为虚岁）。而这些人，多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有些已是学界耆宿，甚至是堪称国学大师的大学问家了。

其二，由此可以窥知当时学界那种平等、健康、宽松、活跃的人际关系。

老北大的教师队伍，包容了新旧思想、不同学派乃至对立政治团体的各色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的思想交锋自然是难免的，但那又多只是思想观念、学术观点、治学方法之争，而极少发生个人狭私、小团体的一己之利，或关涉彼此名利得失的勾心斗角冲突。旧派与新派教授常是在课堂上大唱对台戏，不仅各讲各的一套，且常有攻击对方之语。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大纲”，而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陈汉章便在他的课堂上对学生说：“胡某人就是不通，这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这哲学史大纲岂不是大纲的大纲？”

不通之至。”反对白话文的黄侃在课堂上比较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优劣时，竟举例说：“比如，胡适之先生的夫人死了，家里发电报告诉他，那电文要是用白话文必得这样写：‘你太太死了，赶快回家呀！’这需 11 个字，如用文言文，则只用‘妻丧速归’即可。”这貌似人身攻击之语，其实皆只是学术观点的对立，因而被攻击者并不觉得难堪，也便一笑置之。即使像辜鸿铭和胡适这样思想立场森然对立的同事，也常常在一起盘桓谈笑，毫无芥蒂。一些学术上的论敌，又往往就是很亲密的朋友。并不像后来那样，学术观点上的论敌，常常就成了生活中的仇敌，真可谓“道不同，不相与谋”。

其三，“卯字号”的称谓，使人联想起 20 世纪初荟萃于这所最高学府的诸多学界大家硕彦，这是由“兼容并包，学术民主”的办学方针引发出的成果，而这种学术繁荣之风又促进了人才的成长、新秀的辈出，此所谓“一代名师铸名校”也。

胡适何时取得博士学位

胡适于1917年秋受聘任北大教授，人们尊为“胡博士”。后又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北大校长。几十年中，“胡博士”的声名响彻四海。

1917年胡适来北大时是博士吗？他的博士学位究竟在何时取得？

胡适是1917年9月10日来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其实，早在1917年的1月间，北大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就写信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信中说：

书局成立后，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百元。蔡子民先生已接北京总（大学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子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

胡适于1917年6月9日离开纽约，7月10日到达上海，即回故乡安徽绩溪家中小住，9月10日到北大就任。

胡适到北大任教时，人们都称他为“胡博士”，他自己也是以博士自居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于1919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封面上印的就是胡适博士著。其实，他当时尚未正式取得博士学位。

胡适于1910年7月从北京考取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费生，8月16日从上海去美国，9月，入康乃尔大学读农科。1912年春，改入康乃尔大学文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又兼习文学、哲学。1914年6月从康乃尔大学毕业，得文

学士学位，随即入研究院读书。第二年9月去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修哲学，受业于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教授。他在那里读了两年。第一年，他通过了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初级及格，即开始写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17年夏，他通过了论文的最后一口试。这样，他便在哥大完成了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了。

《胡适留学日记》中有1917年5月27日追记的《博士考试》一节，他写道：

五月廿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主试者六人：……

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

吾之“初试”在前年十一月，凡笔试六时（二日），口试三时。

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

（《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

20世纪50年代，胡适应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请所作的口述回忆中，曾说：

我在1915年9月注册进入哥大哲学系研究部。其后一共读了两年。在第一年中我便考过了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初试及格，我就可以写论文；我也就（可以）拿到我的（哲学博士）的学位了。1917年的夏季，我就考过我论文最后口试。所以两年的时间——再加上我原先在康乃尔研究院就读的两年——我在哥大就完成我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了。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但在此时，国内召唤他回国任职，而北大教授又是他所理想的职业，那优厚的薪俸也令他满意，他便回国来了。1917年4月19日，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吾母膝下：

前寄第五号书，言或能于六月初起程归国。今以大考期在五月廿二日，考后匆匆，不能于几日之中摒挡一切未了之事，故六月中已不能起程，仍须待至七月初耳。……

连日因赶紧将论文抄完，故极忙，不能多作书矣。论文五日内可

成。论文完后，即须预备大考。

此次大考，乃是面试，不用纸笔，但有口问口答，试者为本科各教长，乃旁习各科之教员，但想不甚难耳。

此时论文已了，一切事都不在意中。考试得失已非所注意矣。这几年来内，因在外国，不在国内政潮之中，故颇能读书求学问，即此一事，已是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但既已下来，亦不得不应大考，以了一事而已。

（《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关于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也曾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公案，概括起来说，有“疑胡”和“卫胡”两派。疑胡派有胡祖强、杨大杰等人。卫胡派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和汉学家富路得（Luther Currington Goodrich）等人。

对胡适的博士产生怀疑（或者说是困惑）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前馆长林顿（Howard P. Linton）。《胡适口述自传》的译注者、美籍华人作家、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0）一书中写道：

为胡先生的学位问题弄出很尴尬场面的第一人已是故哥大东亚图书馆前馆长林顿先生。林氏为纪念哥大二百周年之校庆，于一九五二年开始编纂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这本目录包罗万有，独独把“胡适”的“论文”“编漏”了。校园内一时传为笑谈。林氏也自认为一件不可恕的大“乌龙”而搔首不得其解。他是根据校方正式记录编纂的，为什么校方的正式记录里没有胡适论文的记录呢？

第二个为这一问题伤脑筋的是袁同礼先生。袁氏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了一本《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在他费时十年的编纂期中，袁氏受了无数的意想不到的骚扰。因为有许多“老博士”都是袁先生数十年的老朋友，大家都已“博士”了大半辈子。如今在这本新出的洋进士题名录中，居然录上无名，岂不糟糕？

根据袁氏所收的资料，截至一九六〇年止，哥大授予华人博士学位的人数为全美各校之冠。但是根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则退居第二

共二〇三名（伊利诺大学第一共二〇四名）。因而在袁氏编纂期中，他交给我一个名单要我在哥大替他帮忙“复查”一下。在这名单中，想不到“胡适”也是问题人物之一！

袁先生分明知道胡先生是哥大一九一七年的博士，为什么哥大提供的正式记录上却晚了十年呢？笔者为替袁公帮忙，并为好奇心所驱使，乃自哥大“校史图书馆”和其他有关部门，以胡适清查虚云老和尚的家世和年龄的办法，把胡适“老和尚”和其他十来位小和尚的度牒案底也彻底清查一遍。结果我替虚云老和尚报了个小仇。我告诉袁先生说胡先生的正式学位记录确是一九二七而非一九一七。其他有关文件我就未向袁氏作不必要的透露了。我知道他处理这一问题相当棘手，因为那时大陆和台湾两地都以“打胡适”为时髦。袁氏少知道一点真相，反可减少他精神上的压力！这位诚实的迂夫子那时已被类似的问题弄得头焦额烂。如果别人再说袁同礼说的，胡适是个假博士，那袁氏岂不要跳楼？袁先生最后决定把这两个相差十年的年代在他底“目录”上并列，才结束了我二人这段小“考据”。

由以上文字可知，关于胡适的博士学位的获得时间，唐德刚是在哥大做过细致的调查，在校史图书馆和其他有关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才得到了准确结论的，这当然是可信的。但是，胡适是在1917年夏季就考过了博士论文最后的口试，为什么直到1927年才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呢？这又不得不详细考察一下那时哥大博士学位的研读和授予过程了。

在《胡适口述自传》第5章《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的注释〔1〕中，唐德刚写道：

要了解胡适之的博士学位，得先了解哥大有关博士学位的考试制度和当年中国学生读学位的惯例。

胡适之时代的哥大文科博士学位研读过程是：研究生修毕规定学分之后（胡氏在康乃尔研究院的学分，哥大是承认一部分的），还要考过一道笔试、一道口试、一门欧洲语。门门及格，这样才算是“博士候选人”（Doctoral Candidate）。既为“候选人”，便可选择题目，撰写“博士论文”了。论文完毕，再来一道“防卫口试”（defense oral）。防卫口